

doi:10.16060/j.cnki.issn2095-8072.2020.01.002

“修昔底德陷阱”还是“艾利森陷阱”？ ——兼论中国的应对之策^{*}

张晓通 郝念东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描述当前中美关系时引入“修昔底德陷阱”概念, 把雅典与斯巴达间的战争归因于新兴大国对守成国的挑战, 由此推论日益崛起的中国与居于全球领导地位的美国爆发战争是大概率事件。然而, 仔细研读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双方战争的叙述, 会发现将雅典与斯巴达类比中国与美国, 有明显的削足适履之嫌。“修昔底德陷阱”实质上是艾利森对修昔底德的误读, 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国际舆论, 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认知陷阱——“艾利森陷阱”。其谬误在于: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不是雅典力量的壮大, 而是雅典的过度扩张政策和实践; 权力格局变化不是战争爆发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中美之间和雅典斯巴达之间也不具有相似性。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中美外交的启示在于: 坚持和平崛起; 妥善处理守成国面对崛起国的恐惧。

关键词: 伯罗奔尼撒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陷阱;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072(2020)01—0013—10

“修昔底德陷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2年《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他在文中援引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总结——“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 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提出“新兴大国在挑战守成大国时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解释国际权力格局变化的重要概念。在他看来, 中国和美国就像雅典和斯巴达, 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终将威胁美国地位与利益, 战争不可避免。2017年艾利森将相关思考拓展成专著《注定一战: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自视为上帝选民的美国认为, 民主政府的扩张将带来一个更和平的世界和一个更安全的美国。而中国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崛起, 大大违背了美国的预期与想象, 使美国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艾利森直接把中国实力增长的表现视为威胁, 把中国所有发展建设视为夺取霸权的行动, 把中国对南海岛礁建设与正常防卫夸大为修订美国业已建立的太平洋主导模式的重要信号。^①为验证结论准确度, 他统计出自1500年以来新兴国家挑战守成国家的15次事例中有11次带来战争的结论, 认为威胁与反威胁导致国家间竞争, 进而演变为

*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高铁走出去的地缘政治风险研究”(项目编号: 15BGJ046)的资助。

① Graham Allison, “China's Ready for War—Against the U.S. If Necessary”, *Los Angeles Times*, 2017-08-08.

对峙，最终爆发战争。因此得出，强有力的因素使得21世纪中美之间面临严峻挑战，战争一触即发。

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发学界广泛思考与讨论，许多国外学者在研究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时都会考虑“修昔底德陷阱”的影响，认为中国作为新崛起大国对美国霸主地位构成严重威胁与挑战，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崛起似乎被视为威胁当前国际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很快，“修昔底德陷阱”概念遭到国内外名家的普遍商榷与质疑，纷纷发文论证其内在认知与逻辑矛盾。^①本文据修昔底德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爆发时机、双方力量对比及双方国家特质，剖析艾利森的悲观、错误解读，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误导了国际舆论，造成一种新的认知陷阱——“艾利森陷阱”。

一、修昔底德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中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演变的核心概念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与斯巴达。回溯历史源头分析概念本质能够从根本上发现“陷阱”的不合理性与不准确性。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描述了从战争爆发到迪西里亚战争和爱奥尼亚战争，即公元前431~411年20年间每年双方战况。^②这场战争是希腊城邦历史的转折点，不仅标志着雅典霸权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整个希腊城邦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修昔底德在书中客观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希腊各城邦在战争局势中的行为变化，对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高危时机以及作战双方特性做了清晰描述。

（一）战争爆发的原因

有关战争爆发的原因，修昔底德这样描述：“在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们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势。斯巴达人虽然知道雅典势力的扩大，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制止它；在大部分的时间内，他们仍然保持冷静的态度，因为在传统上，他们如果不是被迫而作战的时候，他们总是迟迟而作战的；同时也因为他们自己国内的战争，他们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最后，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消灭雅典的势力。”^③从中可见，雅典在实力达到顶点后，没有满足现状，而是继续扩张，并且开始侵略斯巴达盟国。这自然被斯巴达人视为威胁，并予以反击。雅典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其远征西西里，破坏斯巴达的粮食供应地——叙拉古所致。这次远征导致雅典失去最精锐的军队和几乎所有的舰

^① Jonathan Kirshner, “Handle Him with Care: The Importance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 *Security Studies*, 2019(1); 任晓. 中美能够避免迎头相撞[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11); 晏绍祥. 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J]. 历史研究, 2017(6).

^② 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止时间为公元前431~404年，修昔底德因各种原因完成对战争五分之四的叙述。

^③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1.

队，丧失了海上优势。根据修昔底德的叙述，导致斯巴达出兵的真正原因不是雅典实力的增长，而是雅典的扩张及侵略政策。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原因源于雅典就依庇丹努事件与科西拉结盟，从此迈出了破坏休战合约、发动战争的第一步。斯巴达作为守成国，一直安于维持地区霸主现状，本无心出战。一方面斯巴达认识到自身的海军力量比雅典略逊一筹，同时也考虑到战争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影响与巨大成本；另一方面，斯巴达人一贯的处事风格是“迟缓”、“慎重”，主张通过外交抗议进行调解，所以斯巴达始终以遏制对方、保全自己为目的。在依庇丹努事件出现之前，尽管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变化，但是两个国家仍无心开战。所以是科西拉的第三方行为影响、改变、激化了雅典的策略与观念，进而迫使斯巴达选择开战。

（二）高危时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早已超过斯巴达。战争伊始，伯利克里在鼓励雅典人民迎战伯罗奔尼撒同盟入侵亚狄迦时提到：

“除了从别的来源所取得的收入以外，每年由各同盟国所缴纳的贡款平均达到六百他连特；在雅典的卫城内，还存有六千他连特银币。”^①也就是说，据保守估计，雅典至少持有一万两千六百他连特。^②相比之下，斯巴达经济落后，因为“斯巴达人没有要求他们的同盟国缴纳贡款”，^③而且“无论在个人方面或国家方面，他们没有金融财富”。^④斯巴达人也不关心经济发展，依靠农耕经济自给自足。至于军队，“他们（雅典）有一万三千名重装步兵，再加上防守各地和实际参加防守雅典城市工作的一万六千名。此外，还有一千六百名徒步射手，三百条三列桨战舰准备随时加入战争。”^⑤与之相比，虽然斯巴达领导的整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陆军合起来在6万人以上，但战船仅有100艘左右。^⑥文化软实力方面，雅典的哲学、艺术、历史、建筑、戏剧以及民主理念等更是远远超越了斯巴达。

（三）双方性质类比

1. 贸易国 vs. 农业国

雅典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先进发达的航海技术，海上贸易繁荣，属于典型的商业贸易国。“他们（雅典）一开始想要一件东西，他们就马上取得了那件东西，他们的行动是这样迅速地和他们的决心相伴随的。”^⑦凭借最优良的船只、最安全的港口和强大的海军力量，雅典控制着海上航线和贸易市场。从贸易中积累的财富也让

①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0.

② 雅典同盟国计有大约14个同盟国，除了开俄斯、列斯堡和科西拉供给船舰外，其余的同盟国供给步兵和金钱。参见：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11.

③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6.

④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00.

⑤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1.

⑥ 晏绍祥. 古代希腊[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49.

⑦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0.

雅典人产生更强的优越感和控制欲，这种控制欲使雅典逐渐把斯巴达同盟城邦排斥于所有雅典帝国的海港以及雅典市场之外。这种维护经济安全、实行经济霸权、控制贸易通道的需求诱使雅典做出远征西西里、进攻叙拉古的决定。占领西西里不仅意味着雅典会获得一片物产丰富的海外殖民地，实现控制全希腊的宏图大业，还能切断伯罗奔尼撒人的战略补给，以西西里岛为基地，从后方攻击斯巴达及其盟友。叙拉古不仅是伯罗奔尼撒的天然盟友，同时也是西西里岛的霸主。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即使叙拉古与雅典具有相同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也无法阻挡雅典的扩张之路。

相反，斯巴达以农业经济为主，属于典型的农业大国。平等务实的交易原则使斯巴达人以安全和稳健著称。这表现在直到波斯人远达伯罗奔尼撒以后，斯巴达才调出相当数量的军队赴战场抵抗。面对波提狄亚被围，科林斯人跑来斯巴达求救和控诉，斯巴达还再三犹豫，始终不愿破坏休战合约。斯巴达始终对战争持消极态度，因为战争对农业生产与农民收入的影响最为严重，给农民带来的负担会大大超过可能的收益。

2. 海权 vs. 陆权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第一章即题为：“海上势力的重要性”，可见修昔底德对海权的重视。众所周知，雅典海军规模庞大，作战技巧高超，军事经验丰富，是当时希腊三大海军重要力量之一。^①雅典初期采取“伯利克里战略”，即以海制陆，在陆上坚守城池不与斯巴达军正面冲突，在海上派出舰队不断袭扰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海域。斯巴达拥有大批素质优良的步兵，选择从陆路进攻阿提卡半岛，离间提洛同盟内部成员。由于双方均因势利导，雅典虽然在开始阶段勉强占据上风，却始终无法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之所以获得最终胜利，就在于它及时寻求波斯的支持大力发展海军，使海军作战技术和船舰装备迅速完善，以200艘战舰封锁雅典，最终战胜原本占据海上优势的雅典。

3. 提洛同盟 vs. 伯罗奔尼撒同盟

提洛同盟是以雅典为首的帝国体系，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帝国色彩较少。斯巴达没有强制要求其同盟国缴纳贡款，而雅典则强行将同盟国海军（只有开俄斯和列斯堡是例外）纳为己用，同时收缴贡款。^②国家加入同盟的目的是团结力量获得安全和稳定，并且国家在选择建立、解除或背弃同盟关系时拥有自主权。一旦盟国意识到共同分担的安全边际成本超过通过自身或其他同盟取得安全的成本时，就会选择退出，引起同盟解体。因此，在缺乏超国家权威机构存在的情况下，不存在永久可靠的同盟。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同盟容易因领导国的扩张损害成员国对共同利益认知的一致性而解体。雅典对同盟国的压迫与剥削，使盟国计算出结盟与独立自主的边际效用之比，最终出于国家安全与财富考虑选择脱离。

由此反观“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或自身思维局限，艾利森欲

^① 另外两大力量是科林斯和科西拉。

^②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18.

借修昔底德之名巩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地位，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远不止新兴大国与守成国关系那么简单，双方国家意愿与特质、国际环境等因素不容忽视，因此，一以概之的盖棺定论明显是不足为据的。

二、“艾利森陷阱”的形成

艾利森套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经验，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来警示中美两国妥善处理大国关系，防范战争，然而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高危时机、新兴国与守成国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误读。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实质上是以误读为基础的“艾利森陷阱”，是艾利森对当代国际关系中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关系走向的误判。

（一）对战争原因的误读

艾利森直接把雅典和斯巴达推向战争的作用力归结为“雅典不断的崛起和斯巴达与日俱增的担忧，斯巴达担心雅典会威胁自己在希腊的主导地位”，^①他并没有推敲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正如前面分析所言，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是雅典扩张过度。“斯巴达人之所以决议合约已经破坏，应即宣战……是因为他们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见事实上希腊的大部分已经在雅典控制之下了。”^②也就是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即一方崛起引发另一方恐惧从而引发战争，而是源于一方无节制的过度扩张，导致另一方感到忍无可忍。

正常崛起并不代表着扩张。就崛起路径、表现形式看，中国基于广袤的自然资源、庞大的人口数量不可能成为小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里，国家强大不以个人意志、国家意志为转移，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艾利森不加区分地把崛起与霸权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强必霸，扩张是霸权的必然选择，以致把常规军事演习视作战斗示威。这种缺乏理性的判断，容易引发安全困境，导致不必要的对抗与冲突。

（二）对高危时机的误读

仅从权力转移理论角度看，艾利森对中美关系的悲观预测看似有章可循，但绝非如此简单。奥根斯基(A.F.K.Organski)认为，如果一个大国的力量增长到至少为现主导国力量的80%，则该大国会被看作是现主导国及其国际体系控制力的“挑战者”。当不满意的国家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③同时，随着他国实力的逼近，霸权国家极易出于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不安与恐惧进行军备竞赛甚至不惜先发制人引发战争。双方在各自“自我实现的

^①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54.

^②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2.

^③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68: 123.

预言”中促进冲突升级，最终爆发战争。而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发生在雅典实力超过斯巴达之后，这一时机远远滞后于权力转移理论逻辑，也就是说，国家间实力变化格局虽然与战争爆发存在一定关系，但战争复杂性决定爆发时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三）对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关系的误读

艾利森根据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力量强弱把中国比作雅典，把美国视为斯巴达，然而这种类比在很多方面并不适用。例如，在经济模式、军事力量、国际关系联盟甚至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国与雅典的相似度并不高，美国与斯巴达更不具有相似性。相反，美国反倒更像雅典。

从经济模式看，美国更类似于雅典的商业主义。美国在南北战争后迅速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19世纪末期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二战更使美国作为世界工厂，源源不断向外输送商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取与积累财富。发达的贸易推动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构建与指导，战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大机构成立，确立了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使美国在国际金融与投资市场占据绝对优势。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推动美国稳步发展，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居世界首位。^①而中国则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广袤的农田、肥沃的土地、充足的人口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重农抑商也成为历代君王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源远流长的农耕思想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勤劳务实的中国人民，他们历经多次战争洗礼后，极度厌恶战争，崇尚和平。

从军事力量对比看，美国明显在海军建设领域领先中国，与雅典更为相似。美国对海军建设的发展与关注起步较早。马汉将军的“海权论”一直被美国政治精英奉为圭臬，美国一直致力于成为全球海上霸主。2016年，美国海军兵力员额32.73万人，作战舰艇280艘，作战飞机4094架。特朗普上台后明确提出将扩充军备，其中，美国海军将拥有一支约350艘舰艇的强大舰队。^②美国不仅拥有全球最为庞大的航母战斗群，还拥有多艘两栖攻击舰和神盾舰，在水面舰艇、常规潜艇和战略级核潜艇方面数量和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中国受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重视海军建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军才从零开始，奋起直追。但海军总体实力还远远不及美军。有专家认为，目前美国具有11艘10万吨级航母，将近20艘战略核潜艇及近60艘攻击核潜艇，单单是这些顶尖战斗力量，就相当于我国整个海军实力的五倍以上。^③

从对外关系看，美国战后主导创建国际规则与秩序，宣扬美式民主自由。在此期间，欧洲“马歇尔计划”、中东反恐行动等切实为世界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提供过有

^① 美国国家概况[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2019-09-10].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1206x0_680530/.

^② 李红军. 美国海军近期总体发展趋势[J]. 现代军事, 2017(9): 63-69.

^③ 独家数据：中国海军实力远远不及美国！需继续努力[EB/OL]. 鼎盛军事网[2018-04-27].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8696657972131331&wfr=spider&for=pc>.

力支持。但是，对他国内政过度干预、对全球公共责任的不平等分配也引起诸多国家的不满与抵制。面对霸权危机，美国采取“美国优先”原则，以单边主义指导外交活动，不顾同盟伙伴关系与共同利益要求，把任何利己行为置于优先选择。对欧施加汽车关税以扭转贸易逆差，以退出为要挟迫使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新的双边经贸协议。与此相反，中国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坚持以规则为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顺应全球化潮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与建设者，以实际行动团结亚欧各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扩大成员，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分析，中国与雅典相似度极低，美国和斯巴达更不具有相似性，所以，将雅典与斯巴达类比中国与美国，有明显的削足适履之嫌。同时，中美之间和雅典斯巴达之间也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关系，中美当前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也远远不是希腊城邦时代的历史和格局。修昔底德对战争与国际关系规律的描述无法为当今国家间形势提供充分的解释依据，更不是国际关系的铁则。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只能是艾利森对修昔底德的“有意”误读和曲解，更像是一种人为制造的陷阱。正如有学者提出，这是一场经过精心包装的话语陷阱。这种有意误读形成了一种新的认知陷阱——“艾利森陷阱”，为中美关系平添阻碍。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这种人为制造的“陷阱”是荒谬的或者说是蓄意的，对世界和平发展不具有任何积极正向的意义。

三、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中美外交的真正启示

中美大国关系是当前影响国际力量格局与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中美关系走向将决定两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环境与方向。与其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生搬硬套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如认真汲取这场战争实在的经验教训，以推动形成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发展。

（一）坚持和平崛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真正能够给中美带来警示的是坚持和平。不管是雅典还是斯巴达，经历了战争之后，同盟都纷纷解体并最终走向衰落。众多历史经验似乎表明国强必霸，国霸必衰，大国兴衰更替已成历史自然规律，但是全球化、核力量、新型公共问题的出现改变了国家间关系与世界权力格局。对于中国来说，当前中国依旧处于发展阶段，而战争是发展的头号敌人。郑必坚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概念。中国有别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与思想意识形态，中国不依靠战争改变原有国际体系，不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而是创建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以自身的发展维

护世界和平。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对中国历史上“和合”思想的继承发扬，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关系的理性判断。

中国崛起得益于二战后的持久和平，享受到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国际多边经贸合作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体会到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意识到国际社会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为此，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理念，把国内结构性改革与对外开放紧密联系，对内贯彻落实可持续科学发展观，对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际交往原则，建立广泛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借助国际共同市场和资本融合发展经济，借助技术交流和信息共享壮大军事实力，借助文化互鉴和学术沟通增进认识，实现崛起；另一方面，中国继续坚持共同发展理念，反对对外扩张，把国家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相融合，坚决不以牺牲别国利益谋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维护世界和平。

（二）妥善处理守成国面临崛起国的恐惧

随着战争规模与武器的升级，热战已成为国家战略选择的下下策，但国际权力格局更迭依旧会加大守成大国的不安全感。雅典最终与斯巴达兵戎相见，是由庇丹努事件、《麦加拉法令》、纳克索斯干预等一系列事件层层触发的。雅典不仅对斯巴达保持恶意，对自己保持过度的自信，而且斯巴达也对雅典产生有不可忍受的恐惧，对自己保持盲目的自信。两边都对自己的能力过度自信，对对方却没有明确的认知，这是很致命的。

中国应对崛起过程中来自外界的各种防范或打压做好心理准备，保持理性克制，理解并帮助调整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情绪及心态。最近，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种种行为极可能加剧全球军备竞赛，打破全球战略平衡，为世界安全增加不稳定性。这可被理解为美国变得不自信、缺乏安全感与包容性的表现。当中国经济实力超过美国后，这种不安全感有可能达到峰值，美国极有可能进入穷兵黩武状态。特朗普总统及其后任短期内不会改变对华强硬政策。所以对于美国未来对华政策导向，中国应审慎对待美国的心态转变和反应，积极消除美方疑虑。中国可以借助全球化市场向美国民众传递互利共赢信心，借助元首外交向美国决策者坦诚释疑，增进互信。国家间须通过多层次有效沟通机制，尽力在多领域达成双方或多方共识，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合作。如果能建立起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纵然决策者个性使然，国内大众也不会允许战争的发生。

美国国家特性也孕育着新型国际关系的可能性。就中美当前现状看，美国不似以往传统僵化的守成国家，依旧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在全球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依然占有绝对的优势。美国应跳出零和博弈思维，理性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平等姿态参与协商。面对分歧时，两国决策者应始终保持沉稳与自持，坚

^① 郑必坚, 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的讲演[J]. 理论参考, 2004(5): 3.

持通过协商解决争端，以事实为依据，以发展为目标，全力落实促进双边关系向好的可行措施。同时妥善引导美国大众对华正确认识，积极培养共识，共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承担起世界大国责任，避免制造出原本并不存在的“修昔底德陷阱”。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悲惨结局反映出战争对作战双方甚至国际社会的深刻持久影响与不可逆转的损失。贸易战同样殊途同归，只会带来双输，甚至危害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与秩序，增加全球危机风险。所以中美双方都应对国家战略深入反思与审慎调整。作为大战略的精华，《伯罗奔尼撒战争》一书对今天依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战略关键在于避免过度扩张，避免不审慎的军事和战略透支，而不是制造“修昔底德陷阱”，为国际关系增添冲突与张力。

随着国际社会制度的完善、人类共体同意识的构建以及和平路径的多元化，战争逐步弱化甚至消失，“G2”、“C2”、“竞争性相互依存”、“战略再保障”等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不断涌现。伯罗奔尼撒战争已成为历史，世间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和平崛起的政策、对战争的预防以及对战争诱发因素的警惕能够对中美关系防微杜渐，避免严重后果。中国一直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作为，用实际行动向美国及世界传递中国的和平信念与合作诚意，尽力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接纳。美国也需理性接受国际权力格局变化，抛弃传统对立的零和思维模式，参与调整国际新规则秩序，在避免战争的过程中实现世界共同繁荣与发展。

【作者简介】 张晓通：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外交、地缘政治。

郝念东：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外交。

Thucydides's Trap or Allison's Trap?

ZHANG Xiao-tong & HAO Nian-do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Graham Allison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Thucydides's Trap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ino-US relations and attributed the war between Athens and Sparta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emerging power against the established power, thus inferring that the outbreak of war between the rising China and US as the leader in the world is a high probability event. However, looking back to Thucydides's description of the war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 seems that the analogy between the two sides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apply to the predic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The Thucydides's Trap is essentially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ucydides by Allison, which misleads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us forming a new cognitive trap – the Allison's Trap, to interpret pessimistically Sino-US relations. The fallacies are: the Peloponnesian War was caused by the overexpansion of Athens, instead of its rise; the contrasting pattern of powers is not the decisive factor in the outbreak of war;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t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Athens and Sparta. Therefore, the enlightenmen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on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lie in: persisting in the peaceful rise and avoiding excessive expansion; properly handling the fear of the defending country in the face of a rising country.

Keywords: Thucydides's Trap; Peloponnesian War; Allison's Trap; Sino-US relations

(责任编辑：吴素梅)